

爱是难的

丁辉著

爱是难的，难就难在它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
难就难在当我们有了一千个理由否定爱的时候，
依然要以一千零一个理由说出对爱的含泪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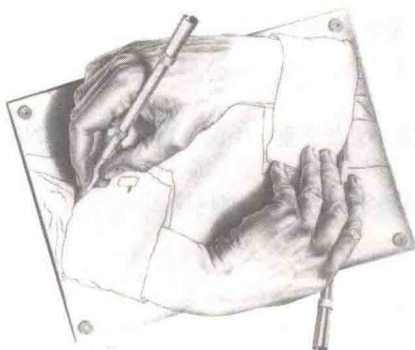
我写的只是常识；
如果常识也让人觉得“偏激”，
只能说明这些常识还远没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

漓江出版社



丁
辉 著

爱是难的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是难的/丁辉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2014.9

(野丁香文丛/向继东主编)

ISBN 978-7-5407-6508-8

I. ①爱… II. ①丁… III. ①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84477 号

责任编辑:赵建培

封面设计:星 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4 字数:132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杂文的“深刻”与“偏激”及其他（代自序）

我写作的“资历”可谓至浅。杂文界鼎鼎大名的魏剑美兄1971年生人，尚小我一岁，然据其自述，已有近20年的写作经历。而我，即使宽泛一点从2007年算起，从事写作也只有区区5年的时间。2007年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钓鱼上。有学生甚至用时髦语式编了一段关于我的“八卦”：“有课的时候，丁师在教室里；没课的时候，丁师在河边，或者在去河边的路上。”

我现在写的东西通常被人称为“杂文”。而我对从事杂文写作起初并不自觉。无非是偶有所感，便信笔涂鸦，至于属于什么文类，并未顾及。倒是妻子的反应提醒了我。当初我整天耗在河边的时候，她固是啧有烦言，然尚能相安；等到我“浪子回头”，整日伏案敲键盘，她却不时流露出惊惶的神情。有一回，她说：“你要是因为放的这些屁，被抓起来，别指望我给你送饭！”她又说：“放这样的屁，要搁‘文革’那会儿，早把你拉出去枪毙了。”也许就是在这一刻，我才猛省：由于厌弃板正、艰涩的学究文字，我常常會写一些我戏称为“性情文字”的东西，使文章带上我情绪的印记，带上我情感的体温，如此一来，已使我的文字沦为“杂文”！写了5年杂文的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好好地活着，没有被“枪毙”，没有被“抓起来”，甚至没有领导找我谈过话，因此我对我们时代的“伟大”与“进步”毫不怀疑，我对这个世界只有感激！

一个杂文作者经常“遭遇”的廉价夸奖也许是“深刻”。我对此的回答是：我写的，或者说我呼唤的只是常识；如果常识也让人觉得“深刻”，只能说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已经蒙上了一层过深的尘土，只能说明人心已经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硬壳。掀掉这些尘土，敲碎这些硬壳

不正是今天杂文的使命？

一个杂文作者最常遭受的指责或许是“偏激”。我对此的回答是：我写的只是常识；如果常识也让人觉得“偏激”，只能说明这些常识还远没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我对于如今这个“伟大时代”没有过高的期待，只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能离“常识”越来越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常识”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也好让我早点摘掉“偏激”的帽子——戴着这样一顶帽子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生活在一个“常识”和“常情”的世界里，到那时我情愿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做一个“平和中正”的人，也不去写什么劳什子杂文！

套用别人说的一句话，一个杂文作者只是通过自己的文字，向公众揭示“太阳是从东边出来的”这样一些真理。一个大多数人都愿意闭上眼睛相信“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的世界就是一个背离了“常识”和“常情”的世界。杂文作者是这样的世界里的理想主义者。与这样的世界不合作、不妥协是杂文作者的使命，也是宿命！

然杂文能救世乎？我从来不敢想，我想的只是如何救自己。鲁迅当年说：“一首诗吓不跑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跑了。”老先生奠基了杂文这一文体，并且以其深刻、犀利、渊博、睿智为这一文体树立了至今让人难以跨越的标杆。然老先生对文字的“济世”之功每感悲观，这份清醒与智慧也许会使杂文作者从“救世”的迷狂中超拔出来，从而对于现实，既能入乎其内，又能超乎其外，保持批判性的距离。这许是杂文的出路之一端吧。我跟学生讲过：在现实生活中我几乎就是个废人！阅读和写作便是我的“躲藏”。有的学生谈恋爱谈出了矛盾，也来找我。我说，我连自己的老母和媳妇的关系都处理不好，哪里敢以“人生的指导者”自居！在现实生活中我只是一些碎片，阅读和写作就是我的“语言疗伤”。已故的我们当代的大思想家、发明了“东方主义”的爱德华·萨义德说过：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写作就成了他的居住之地。每每想起萨义德的这句话，我就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本文是作者为《杂文选刊》2010年11期“丁辉新作小辑”专栏写的“作者告白”，权作序。）

目 录

杂文的“深刻”与“偏激”及其他（代自序） / 001

第一辑

有一种爱离我们还很遥远 / 003

勇于不敢 / 009

爱是难的 / 012

任何人的苦难都不能被抵消 / 015

积极生活的意义 / 017

第二辑

鞭炮声中的“自由”与“民主” / 023

好单位，孬单位 / 026

兔子不是自由主义者 / 028

不义不可多行 / 030

说说制度“成本” / 033

什么东西被“整齐划一”掉了？ / 036

汪强先生的“一棵泡桐树” / 039

“为善而急人知” / 042

返诸己身 / 044

为什么那些“神医”都是中医？ / 046
消费时代 / 049
说“全面” / 052
做美国人妈妈的感觉如何？ / 054
说“偏至” / 056
“无意插柳”与“有心栽花” / 059
“真理”的灾难 / 062
墙上的话 / 064
卑劣性“爱国” / 066
说“卑怯” / 068
关于一则标语的诗学、政治学辨析 / 070
谁来制衡资本？ / 072
“传统”的台湾 / 074
暧昧的汉语 / 077
杂草丛生，干卿何事？ / 079
“创卫”之“风” / 081

第三辑

他们同样需要尊严与爱敬 / 085
影视艺术的“能”与“不能” / 088
地坛在我们 / 091
也谈“四大名著” / 094
孩子的眼光 / 096
“穿帮”时代 / 098
从我的“词语洁癖”说起 / 100
生命原是什么也不需要的蓝天 / 102

我的悲观主义宣言 /	105
“规矩可以滚蛋！” /	108

第四辑

悲哀的“历史” /	113
赵匡胤的三条“遗训” /	116
“谋道”与“谋食” /	119
曹氏兄弟 /	125
帝王真相 /	128
谁是英雄？ /	131
做官与做好人 /	134
孔子的“务实” /	136
刘备《诫子书》 /	138
“自我实现”的预言 /	140
李约瑟的误会 /	142
鲁迅与“五四”的“反传统” /	145

第五辑

“小石头”、“手电筒”与反低俗 /	153
鲁迅的“战术” /	155
给教育部门的同志们讲故事 /	158
是管理教学还是管制教师？ /	161
鲁迅与周木斋 /	163
“教师相” /	166
论“京剧进课堂”应该缓行 /	169

从“老师打校长”到“家长打老师”	/ 172
名人的“书法”	/ 175
读鲁迅，看今天	/ 177
如果不是现在，又会是什么时候？	/ 181
我的“师德”问题	/ 183
鲁迅“走后”怎样？	/ 186
尴尬的“中文”	/ 189
我能不能不当官？	/ 192
莎士比亚做什么生意？	/ 195
写作如何成为一门“学”？	/ 198
“做好事”	/ 201
朱自清《背影》的背影	/ 203
“少年读鲁迅”的危险在哪里？	/ 206
小说作为手艺	/ 208

附录

杂文，犹有可为	/ 211
---------	-------

致谢	/ 216
----	-------

第一辑

Chapter 1

有一种爱离我们还很遥远

勇于不敢

爱是难的

任何人的苦难都不能被抵消

积极生活的意义

有一种爱离我们还很遥远

我接触西方文学比较晚。当我有条件阅读西方经典的文学作品的时候，那个年代以“冷酷”和“仇恨”为主题的教育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我的感性和理性的塑造。如果说当年的我并没有被那种“教育”俘获，并没有被那种“教育”完全湮灭了良知和理性，如果说今天的我稍微具备了一些对历史和现实中的残忍与血腥进行检视及批判的能力，我就得感谢像《悲惨世界》那样的西方经典馈赠于我的精神资源。作为一个研究和教授中国文学的中国人，我不得不满怀羞赧的承认，是西方文学，在我思想成长的重要关口，给了我灵魂的冲击与心灵的震撼，从而彻底扭转了我对这个世界、对在这个世界上繁衍生息的人类生命的认知路径。

今天，就从《悲惨世界》说起吧！

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养活自己和自己姐姐的6个孩子，在面包店偷了一块面包。冉·阿让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坐了19年牢。监狱中的冉·阿让就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审判，因为在冉·阿让看来，在他给这个世界造成的损害和这个世界对他造成的损害之间没有平衡可言。19年后，冉·阿让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的冉·阿让已经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仇恨。

小说读到这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还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它并没有超出我们中国人日常经验和心理经验的范围。长期以来，我们接受的不就是这种关于“仇恨”的教育？不正是这种仇恨造成了我们的小说、电影等文学艺术作品中“遍地开花的大刀长矛和狂轰滥炸的日常暴力”？不正是这样的充斥着“仇恨叙事”的小说、电影乃至教科书在影响着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以及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和对生命的态度？

好在雨果的故事还没有完，而小说中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则是我们中国人万难理解的了。被释放出狱的冉·阿让怀里揣着黄色的通行证，在当时的法国，黄色通行证意味着这个人是个需要备加提防的危险人物。于是旅馆不愿意收留他，他想跟狗一起在狗窝里凑合一个晚上，狗又咬他，他回到监狱，监狱又以“你已被释放”为理由拒绝接纳他。万般无奈的冉·阿让在情急之中敲开了米里哀大主教家的门。《悲惨世界》后来被拍成了电影，这个时候，我们从银幕上看到，冉·阿让用粗野中夹带着油滑和嘲讽的口吻向米里哀主教自报家门：“我是一个劳改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不信，你看我这个通行证都是黄色的，但是，我能在这里借宿一个晚上吗？”米里哀主教听完冉·阿让的陈述，表情平静，他一边让惊愕的女仆到楼上收拾一个房间，并换上新的床单和被褥，一边对冉·阿让说：“先生，你介意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吗？”这也许是冉·阿让几十年的人世生涯中，第一次被人尊称为“先生”！饱尝欺侮、嘲弄、蔑视和践踏的冉·阿让在主教的善意面前惊呆了，他问：“你就不怕我是个杀人犯？”米里哀主教平静地回答：“那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情。”

“那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情”，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说的这句话，据我看来，要算是《悲惨世界》中最深刻的一句台词。《旧约全书》中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意味着对恶的惩罚之权掌握在上帝手中，而诚如卡尔·巴特所言“上帝就是上帝，人就是人”，在基督教的文化观念当中，人并没有讨恶报冤之权，一个人犯了再大的过错也不能成为他在这个世界活该受蔑视、欺侮、践踏的理由。不懂得这一点，就不会懂得，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为什么犯了杀人罪的拉斯柯尼科夫反而成了圣洁的索尼娅眼中最值得怜悯的人，因为在索尼娅看来，一个人犯了罪，所以他是多么的不幸啊！前不久，我曾把电影《悲惨世界》放给我的那些读中文专业的学生看，当米里哀主教对冉·阿让说这句话时，黑暗中观众席上浮起一阵愚蠢的笑声。请原谅我用了“愚蠢”这样的带有侮辱性的字眼！一种光亮穿透黑暗，试图照亮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心灵却因常年积垢而围裹了一层厚厚的硬壳。敲碎这样的硬壳，让阳光照进来，不正是我们今天教育的使命！

然而故事还没有完。天快亮的时候，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家的银器，趁主教和女仆都还在熟睡，匆匆逃跑。然而跑出不远，警察抓住了冉·阿让并且认出了主教家的银器。冉·阿让被扭送着来到主教家，这个时候，只要主教一句话，冉·阿让就将再次面临牢狱之灾，然而，米里哀主教说：“朋友，原来是你啊，窗户上的两个银烛台我也送给你的，你怎么不一起带走？你可以用它们换两百法郎。”说着就从窗台上取下银烛台递到冉·阿让的手上，并且说：“请记住，我赎回的是你的灵魂。”一句话融化了冉·阿让心头18年的冰霜。米里哀主教用爱、悲悯与宽容感化了冉·阿让，引领冉·阿让远离仇恨的黑暗，进入爱的希望与光明之中。冉·阿让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了自己灵魂的转向：从一个内心充满仇恨和报复欲望的人转变为一个笃信上帝、谦卑虔敬、内心有圣光照耀的爱者，走上了忏悔与救赎的新生之路。

米里哀主教这种普遍施与的无差别对待的爱无疑是惯于做“敌我区分”的中国精神难以理解的。鲁迅说：“能憎才能爱。”周恩来给雷锋的题词也强调“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整整影响了几代人的《雷锋日记》更是用中国式的抒情语言高唱：“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如果我单单是接受这样的教育而没有变成一个恶棍，那只能说是上天对我的眷顾！冉·阿让由黑暗进入光明的灵魂逆转同样是中国精神难以理解的。不是早有人运用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批评雨果把这种转变写得“太突兀”、“太不可思议”、“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吗？是不是只有写冉·阿让怀揣仇恨朝财主家扔一颗手榴弹然后上山打游击，或是打起背包奔赴革命圣地，才叫“不突兀”，才合情合理，也才“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呢？人的灵魂跟神圣相遇原本就是个奇迹，就是突如其来的，不可思议的不是吗？要想对米里哀主教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对待的博大的爱有深切理解，自然离不开西方文化的基督教《圣经》传统。《马太福音》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第五章44节、45节）诚如余虹老师所言：“耶稣一生的讲道和践行都在向人们启示这种无条件、无分别、化恨为爱的爱。这种爱经

过两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传播，已经成为西方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部分，并铸造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信念和实践态度。”

以上所写，都是在读了余虹老师的《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南方周末》2007年5月31日）以后，拉杂想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发生的时候，余虹老师正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访学。一名凶手开枪打死了32个人，凶手本人饮弹自尽。余虹老师惊讶地发现，事发第二天晚上，美国各地举行的追思死难者的守夜祈祷仪式上，美国人点燃的是33根蜡烛——凶手赵承熙并没有被从美国人的悲伤经验中剔除出去，他也是美国人悲伤与追悼的对象。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4月20日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放飞的气球是33个，敲响的丧钟是33声，安放在校园中心广场草坪上的石灰岩悼念碑是33块，凶手赵承熙的悼念碑旁边也放着鲜花与蜡烛。我相信这件事一定对余虹老师刺激很深，因为与33根蜡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马加爵的骨灰至今还孤独冷清地在那里无人收留，马加爵的家人直到现在还承受着来自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甚至承受着来自社会机构的歧视。马加爵身后的遭遇再次折射出我们这个民族在精神和情感上的残缺，余虹老师据此发出感叹：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

所有的仇恨都标示着人性的黑暗。致使赵承熙和马加爵走向毁灭不正是“仇恨”这种黑暗的情感？如果这种黑暗的情感在赵承熙和马加爵那里导致了毁灭性的结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我们对这些在黑暗中受伤的灵魂的“恨”就能带来比较敞亮的结果？仁恕施与之心的失落乃至死灭是我们这个民族情感经验当中最值得痛心的事情，把人心的凉薄和人性的黑暗仅仅归咎于恶人恶行是不够的，也是不公平的。那些犯罪者只不过是把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行为发展到极端状态而已。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认为自己是沒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我说：“你们当中谁认为自己是沒有罪的，就去蔑视、仇恨、践踏那些犯罪者吧！”

当年读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巴氏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巴乌斯托夫斯基家旁边有一座监狱，他的母亲经常买通监狱里的监狱长，说是让犯人们到家里来干点杂活。“犯人来了之后，”巴乌斯托夫斯基回忆道，“妈妈把看守们领到

厨房去喝茶，我们就趁这个时候，急急忙忙把面包、香肠、糖果、烟草，有时还有钱，偷偷塞进犯人的口袋里。这些东西都是大人给我们的。”什么样的人民就会哺育出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就会浇灌出什么样的文学之花。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像巴乌斯托夫斯基母亲这样的俄罗斯人民，才造就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辉煌壮丽的俄罗斯文学，他们以苦弱仁慈的爱、悲悯与赦免告慰黑暗年代的辛酸和苦涩，即使是那些罪人也没有被他们剔除出爱、悲悯与赦免的对象之外，因为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即使真的犯了罪，那么这不恰恰证明，他正在灵魂的黑暗之中，更需要仰赖爱与光明的指引以远离黑暗进入灵魂的幸福和喜乐？只有这样的人民，只有这样的民族才配拥有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类历史上伟大的精神价值的创造者。

而相比之下，我们的怨愤情绪由来久矣，据龙应台女士讲，台湾诗人席慕容小的时候，听老师教唱岳飞的《满江红》，对“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样的句子坐立不安，心里不是滋味。龙应台女士分析说，这大概是因为席慕容是蒙古族人的缘故。其实，我想，席慕容心理上对这样的句子的拒绝也许并不仅仅因为她是蒙古族人，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她从更广阔的人类价值的视野上拒绝认同这样的以大义面目出现的嗜血的文化。

造成今天任何人都已无从掩饰也无从回避的人性沉沦、道德滑坡这样的可悲局面的，绝不仅仅是由于随着世俗化社会而来的物欲的膨胀以及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对生命的冷漠与麻木早已进入了我们的血液。而相比之下，西方的文学艺术却总能向我们呈现另一种与这种你死我活的怨愤情绪迥异的精神景观，向我们提供另一种生命境界。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中，那个善良的西班牙向导安塞尔莫和乔丹去炸敌人的一座桥梁，向导认出了在桥上站岗的敌军士兵是自己村子里的人，这个时候乔丹问：“你不忍心了，是吗？”安塞尔莫回答：“不，为了炸桥，我会干掉他。但如果战争之后，我能活下来，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善待每一个人，以便赎罪。”安塞尔莫并不因为对方是“敌人”就认为“干掉他”是理所当然，他竟然认为即使杀掉一个敌人也是“犯了罪”，需要以后“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善待每一个人”来自我救

赎，这样的精神景观和生命境界同样是惯于做“敌我区分”的意识难以理解的，笔者以为，即使在今天，我们也未必有一部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达到了安塞尔莫这句台词的精神高度和人性深度，更无论那些伴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充其量只能算是“政治表态”式的革命历史题材。二十世纪的大半个世纪我们都在打仗，然而我们却没有产生像《丧钟为谁而鸣》这样的堪称伟大的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有什么奇怪？

马克斯·舍勒在为基督精神辩护时说：“爱非自下而上，恰恰相反，爱表现为：高贵者俯身倾顾贫穷者，美者俯身倾顾丑者，善人与圣人俯身倾顾恶人和庸人，救世主倾身倾顾税吏和罪人。”我们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对国家的爱，对领袖的爱，对有德者的爱，少的是这种倾身下顾的神圣之爱，这算不算也是一种精神的贫弱？在所有的爱的经验当中，这种倾身下顾的对“恶人”、对“罪人”甚至对敌人的爱，更需要情感的高贵和精神的高贵，不是吗？如果没有情感的高贵和精神的高贵，何来伟大的文学？

就这样吧，我没有余虹老师那样的一流的超拔的笔力，文章的长度也就不想超过余虹老师。余虹老师取的是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角度，我取的大体是文学批评的角度。作为对余老师文章的呼应与声援，我如果能从一个民族精神成长的角度为余老师所担忧的爱的残缺提供一些另类的佐证，也就足够。

附记：这篇东西写于2007年6月，是在读了余虹老师的《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后感而写的。文章写成好几个月了，一直没有发表出来。2007年12月8日，我又动了那个念头：何不把文章发给余虹本人看一看呢？于是我开始用“百度”搜余虹老师的电邮，谁知第一条竟然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12月6日坠楼自杀”的消息！最初动了把文章发给余虹看看的念头是在此一个星期之前，算算时间，那个时候余虹尚在；谁知一周后，当这个念头再度萌发，一个人的生命竟已如落叶般飘零。

谨以此文作为对余虹老师微薄的祭奠！